

近代南方口岸城市“气候”与“健康” 的特殊历史书写

——以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最健康的口岸”福州为例

孟爱云 刘馨雨

摘要 殖民气候话语在帝国主义与殖民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议题。近代西方殖民者在全球南方热带地区的高死亡率,导致西人对南方气候与健康关系产生焦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五口通商初期的福州却被来华西人归类为健康的口岸城市,特别是新教传教士基于气象测量、个体感知、地理想象和地方实践等多种因素的气候书写,逐渐将福州塑造为“最健康的口岸”。他们对福州气候的认知是殖民气候话语的地方表征,通过将福州“健康”的非热带环境与“致命”的热带地区加以区分,强化了近代西方帝国对全球气候的分类体系。19 世纪 50 年代的疫病在福州西人群体中的蔓延,一度对其气候和健康关系的历史书写构成挑战。面对外界对当地气候的质疑,他们借助“气候适应论”的医学解释观点,有力地捍卫了福州气候的健康性书写。“气候适应论”既是对开埠早期在榕西人与福州城市空间互动的生动写照,又是全球殖民话语下西人对近代中国南方口岸城市的一种特殊历史殖民叙事。

关键词 口岸;气候;健康;历史书写;全球殖民话语

中图分类号 K2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6)03-0069-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2VLS004)

18 世纪中叶以降,西方殖民者在全球南方热带殖民地的高死亡率引发了西方世界对气候与健康关系的探讨。这场源自早期殖民活动的气候讨论,迅速成为医学、人类学、地理学等近代科学的话题焦点,并屡屡登上西方殖民事业的政治辩论场合^[1]。国外历史与地理学界对气候与健康在全球殖民话语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2][3]}。学者普遍认为,殖民话语中的热带气候通常被视为有害的,西方殖民者在不同时期对热带气候的不同书写,折射出气候叙事对全球殖民的响应^[3](P12-21)^[4](P34-37)。学界对热带以外的殖民地气候叙事较少涉及,然而气候在当地的殖民实践中反而以更丰富的形象存在^[5](P176-193)。国内学界在重建中国历史气候序列^{[6][7]}、分析气候变化与社会响应^{[7][8]}、讨论在华西人的气象与疾病调查^[9](P69-93)^[10]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但鲜有以微观视角探讨在华西人与地方气候的互动关系。近代西人特别是传教士的“地方实践”在塑造气候与健康的殖民叙事、推动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等方面是重要的助推者^[11](P50-64),特别是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榕西人对福州的相关历史叙事呈现出地域与全球殖民话语交织的鲜明特性^[12](P234-236)。本文拟以五口通商初期来榕西人围绕气候与健康关系的相关讨论之史料为基础,着重分析在榕西人对福州气候的具身体验与认知,以探讨其气候书写在地方与全球殖民话语中的独特面貌及其内在缘由与实质。

一、“健康”的吸引力:福州开埠与西人印象中的口岸城市

福州开埠以前,西方商人和传教士曾自闽江潜入福建内陆以调查武夷山茶区和闽江的运茶航线,但鲜见有关当地气候的报道。开埠后,西人入驻福州,或长或短的驻留使他们体验和描述地方气候成为可能。

1844年,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委任原广州领事李太郭前往福州主持开埠事宜。6月30日,李太郭抵达福州,在地方官员的安排下居住于福州南台岛上一座民居中。有关这座新辟成的领事住地,德庇时在9月到访时认为它“肮脏且可耻”^[13](P9)。两人随即要求中方重新安排领事住处,并于次年1月在城内乌石山积翠寺租得房屋以之为英国领事馆。李太郭仅就任福州数月便于次年转往厦门。11月,他因持续高烧病逝于厦门寓所。据美部会罗啻的说法,李太郭十分认可福州的健康性^[14](P162)。这一点也为从厦门到访福州的翻译官巴夏礼所附和。生活在疟疾和高烧频发的厦门,巴夏礼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无忧虑。可对于福州怡人的环境,他却大加称赞:“福州本应是令人厌倦的,但这里无比健康,周边乡野风景秀美”^[15](P96)。该年3月,巴夏礼跟随领事阿礼国从厦门转任福州。乌石山隆起的地势为来客俯瞰榕城山水提供了绝佳的视角。他们对本地风景浪漫主义式的描写,为福州城市形象赋予了一种想象的色彩^[15](P106-107)^[16](P58-93)。

受英国圣公会委派,施美夫于1844-1846年间访问新开放的通商口岸以搜集信息。在广州,他的身体健康受气候和劳累过度的双重影响而恶化。在厦门,施美夫直言“此地气候不利于健康”^[17](P307)。在上海和宁波,尽管当地冬夏季存在悬殊的温差,他仍然认为两地的气候适合普通欧洲人的体质。对于福州的居住条件,施美夫赞赏有加,他对西人体质能够应对此地的气候持乐观态度^[18](P218)。施美夫的考察报告与气候认知基本符合开埠早期西人对口岸城市的初步印象。尚处“一口通商”时期,广州湿热的气候已令西方人颇感不适。相比之下,气候在更高纬度的上海和宁波则显得易于接受。关于厦门,西人的高死亡率,疟疾等流行病的频发以及恶劣的居住条件使得它的健康性备受质疑^[16](P50-53)。福州则在开埠初期就被来榕西人塑造为一座环境健康的城市。可无论是对西方商人还是政客而言它的健康形象并不具有吸引力,商业潜力和贸易条件才是他们衡量城市地位的主要依据。德庇时初次到访就断言此地的口岸前景远不如对健康不利的厦门^[13](P10)。闽江通航的困难、茶叶市场的萎靡和地方政府对贸易的遏制等不利因素令除鸦片商人外的洋商们望而却步^[19](P14-16),甚至有西方政客提议放弃福州以交换其他口岸的开放^[20](P609)。

然而,福州的健康性却成为英美传教差会决心开辟相关事业的重要依据。罗啻和施美夫围绕福州的健康性、人口和政治影响力的论述,令其从香港及其他通商口岸中脱颖而出,成为美以美会在华事业的开端^[14](P162)^[21](P40-42)。他们甚至视此地贸易的贫瘠作为开辟事业的优势^[14](P162)。这意味着围绕福州,传教士从一开始就成为西方势力在华扩张的另类面孔,他们的叙事与主流的帝国殖民话语存在明显的分野。当商贸在有关其他通商口岸的叙述中占据主要位置时,气候与健康却在福州传教士的书写中占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最健康的口岸:福州口岸的特殊“气候书写”

在巴夏礼、施美夫等人的描述中,福州的健康性主要从适宜的环境中得到显现,而尚未与气候直接关联。他们对福州气候和健康的描述源自于短暂的生活经验,所描绘的福州意象更偏向于直观的感受。而即将进驻福州的西人特别是传教士则通过气象测量与地方实践从多重维度将有关福州的气候和健康的书写推向深入。

精准的温度计数和长期的生活经历使在榕西人能够较客观地描述福州天气。1847年1月2日,受美部会指派,杨顺从曼谷经广州抵达福州,并暂时以中洲岛为栖身之地^[22](P5-6)。值得注意的是,自杨顺

抵达福州起,本地气候和身体状况成为他相关报告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在福州安顿下来后,杨顺迅速了解福州的气候情况:“这个地方的气候被公认为罕见的健康。我个人感觉到它振奋了我的身体和智性的活力。温度计数在这个季节在52-57华氏度间波动。”^[221](P7)4月杨顺重新写信,称赞福州“广袤而诱人,它的气候(属于)最健康的”^[231](P2)。可见,气候与健康的关联是杨顺对福州地方书写的重点内容。

之后的数月里,杨顺始终保持对福州气候与身体健康的关注,并曾撰文对当地的气候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夏日的炎热往往令在华西人感到倦怠和不适。可即使正值夏季,杨顺对福州气候的肯定仍显而易见。他用详细的测量结果对福州的气温进行描述:

冬季漫长而寒冷,这在炎热的季节结束后,提供令人振奋的变化……春季凉爽宜人……再加上生火会非常舒适。截至今年6月22日,温度计很少或从未超过29℃,一般都远低于这个数字。现在是7月29日,在下午的短时间内,我家中温度有两次达到34℃。但在英国领事馆,气温要低得多。夜间,水银柱有时会降到29℃^[241](P521-522)。

不难看出,在杨顺的认知中,福州气温从冬春至夏秋过渡恰恰是气候适宜的证明。这是因为,在18至19世纪气候与健康的讨论中,有观点认为气温的骤变是引发疾病和人体功能紊乱的直接原因^[31](P45)。在如此语境下,冬夏季悬殊的温差不再令人生畏,因为福州漫长的季节变换成了人身体健康的保证。

气温的适宜为杨顺进一步阐释福州气候的健康性奠定了基调。他指出充沛的降雨避免了炎热的夏季带来的压抑感。短暂的极高温也“并不会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和体力”^[251](P26)。而且从周边山脉吹来的凉风也能缓解炎热、振奋精神,这同样是福州气候健康的体现。在讨论福州气候时,杨顺还有意识地论及福州城内外的水源与水质的差别^[251](P26)。综合在榕西人的意见和其他气候要素,杨顺论断福州的气候条件不亚于其他的口岸城市,西方人能够在这里享有健康的身体^[241](P522)。

相比于早先的描述,在此地生活数月的经验以及持续的气象测量使杨顺对福州的气候有着更为丰富的认知。温度、降水和风向等气候要素已经出现在他的书写中,并导向对身心健康的益处。因此,身心的舒适和活力成为他诠释福州气候和健康关系的标准。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用具体的温度来定义健康气候,反而是用感知和经验来评判福州的气候:“我从暹罗到这里的变化中得到的对健康的益处,几乎等同于回到我的故乡新英格兰,那里的青山绿水与和煦微风之中。”^[251](P26)这种有关气候、水源与风的共论源自西方世界长期盛行的环境医学论述^[91](P75)。可见,西方的技术和知识框架是杨顺试图理解福州气候和健康的依凭。然而科学术语并未消解他的个体经验和具身感知。通过将福州与熟悉的新英格兰并置,并使其与“令人疲惫”的暹罗形成对比,杨顺的“想象地理”印证了殖民语境下的气候层级划分^[261]。他的具身体验“证实”了福州的健康性和对身体的调节作用,从而为西方势力在华扩张提供了有别于主流叙事的“合理性”依据。

来自杨顺的积极消息很快传递给他同期从曼谷转往中国的弼利民,并得到了他的积极回应。在厦门,弼利民向总会表达前往福州的强烈意愿,宣称有消息表明福州是最为健康的口岸城市^[271](P3)。9月,弼利民夫妇与美以美会的柯林和怀德夫妇抵达福州。有关此前收到的积极消息,弼利民与柯林在各自的教务汇报里均表示赞同^[281](P8)^[291](P7)。

对于尚无住所的美以美会传教士而言,寻找安身之地是他们的当务之急^②。鉴于福州城内的小山上只能修建寺庙和公共建筑,而地势低的地段又频繁受水淹,怀德认为福州城内很少有健康的住宅适合居

① “想象地理”的概念经由赛义德等阐发引入后殖民语境。强调西方世界如何虚构“东方”,进而带有政治意图地对“文化他者”和异域景观进行想象性建构。这一观点也运用在有关微观尺度下建构地方形象的研究中。

② 此时杨顺在中洲岛上已另觅新居,怀德与柯林则暂住本为弼利民夫妇准备的杨顺旧居。

住^[30](P1)。坐落在南台地势高亢处的本地商行曾引起两人的注意,可预期不菲的修缮费用令他们犹豫不决。至于对岸南台岛上“理想的住宅”,怀德忧虑毗邻的山丘会阻挡夏日盛行的西南风进而影响房屋的通风^[30](P1-3)。从两人对住宅选址的评判中可以发现,风向、降水和洪涝等气象要素成为衡量居住环境的重要因素。此外,地势高低对气候与健康的影响,也是柯林与怀德划分城市空间的重要参考。依据此种空间参考,以乌石山为代表的城内外地势高耸处成为他们住居选址的偏好。事实上,两人首次尝试租赁的房屋正是乌石山上的一座民居。有意思的是,杨顺曾在描绘福州城市景观时对乌石山予以浓墨重彩^[31](P485-486)。他的气候介绍也折射出乌石山在城市空间中占有的特殊地位。由此,气候、健康与地势的隐秘关联通过杨顺等人的气候书写和地方实践在地理空间中得以具象化。

1848年5月,怀德夫人的去世为福州的健康性蒙上了一层阴影。她的死因不明。杨顺认为她的病因是典型的肺结核,但在弼利民的描述中她的症状除了严重咳嗽外还伴有身体功能紊乱^[32](P3)^[33](P8)。与此同时,初至福州的美以美会的喜谷很快感到身体不适并长时间未见好转。这引起了在榕西人对身体健康的担忧,开始思考疾病的发生是否和天气有关。美部会的摩嘉立认为福州的气候并非病痛的诱因,环境的改善能够保障西人的健康^[34](P5)。尽管与此前看待福州气候的态度略有差异,杨顺在6月写给总会的报告中也指出这绝非意味着福州不健康,因为即便是在最宜人的“气候带”,疾病和死亡也时常出现^[33](P8)。次年,喜谷夫妇因病离榕,柯林也曾一度病重。但在榕西人仍一致认为在口岸城市中“没有一处(比福州)更加健康”^[35](P26)。杨顺也强调,是体格而非气候因素导致喜谷染病。虽然夏日的高温令人“身心俱疲”,但凉爽的季节足以令他们恢复元气,这与在故乡别无二致^[36](P1)。可见,现实的境域挑战了福州气候的健康性,而在榕西人则试图重塑话语体系以维护其健康城市的形象。在这一过程中,福州被归类为“东方”世界的气候区,而西方人在“东方”气候下生活遭逢的困难不仅隐喻两种文明的隔阂,还是对西方体格能否“驯化”和适应“东方”环境的疑问^[37](P8)。

比之于此前施美夫等人的描述,这一时期的在榕西人特别是传教士们对福州气候有着更为细致的刻画。一方面,科学的观测使他们的气候书写有别于此前源自直观感受的描述,各类气象要素被一一纳入进他们的气候话语中,增加了它们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客观的观测结果并非评判气候的唯一标准,身体感知和个体经验是他们书写气候的另一层维度,而身心的舒适与否则是衡量健康气候的重要尺度。耐人寻味的是,在榕西人常将对故乡的印象叠加在福州的气候和环境之上。这种地理想象混合着西方对“东方”世界观念的投射,为地方气候赋予了文化的意义。此外,在榕西人的住居和城市认知还从一种空间的视角阐释气候和健康的关系。正是通过以上多重维度的书写,在榕西人对气候、健康和环境的认知深化了福州城市的健康形象。疾病和死亡的短暂侵袭非但没能削弱气候健康的话语效力,反而将福州推向为“最健康的口岸”。

三、解释疾病:福州口岸“气候书写”的医学转向

现实境遇远非在榕西人所预期的那般“健康”。疫病很快在西人群体中蔓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有关他们身心状况的噩讯不断外传,使外界对此地环境适宜性产生怀疑。尽管如此,在榕西人始终坚称地方气候的健康性并援引医疗传教士和医师的观点来捍卫福州城市形象,从而使得福州气候与健康的历史书写发生了医学解释之转向。

1851-1853年堪称在榕西人的“灾难之年”。传教士历浹于1851年因肺病返美,途中病逝。同年柯林因身体衰弱离榕,次年病逝。怀理夫人于1853年在福州病亡,长期腹泻是她主要的症状。怀德、杨顺、高礼与英国副领事华尔克也因病撤离。1854年的宁静虽然令他们暂缓片刻,但1855年卷土而来的疾病再一次席卷了在榕西人。美以美会曾不无悲观地指出,福州差会遭逢的“疾病侵扰、死亡和种种不利”超过其他在华团体^[38](P99)。单就在榕西人的遭遇来看,福州似乎很难被归类为气候舒适、环境健康的口岸,但来自西方医学的解释成为在榕西人坚信福州的健康性并回应外界异议的有力“证据”。

19世纪上半叶,西方的医学知识仍处于“混合”的状态,表现为传统“体液”学说、环境医学、解剖医学和神经生理学等学说的杂糅^[9](P74-75)^[39](P64-115)。这一时期的在榕西人群中,有两位分别来自美以美会和圣公会的医疗传教士怀理和温敦接受过系统的医学训练。在具体的医疗实践中,两人运用上述医学观念来解释疾病频发的缘由并为西人保持健康提供医疗建议。

1854年返美后,怀理在缅怀业已逝世的同僚时指出,他们的牺牲并非因为福州气候与环境条件的恶劣,此地长期的闭塞,缺少生活物资、简陋的住宅等都是导致疾病和死亡的原因^[40](P48-49)。这些因素都对他们适应本地环境构成阻碍。然而,“置身于新的气候、新的景象、新的生活模式”的西人“必须学会使自身适应”^[40](P49)。在怀理的认知中,福州绝非不健康的城市,西方人应该能够“适应”它的气候和环境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疾病与气候无关,腹泻、痢疾和倦怠是典型的福州夏季症状。而每当西人抱恙时,医师和医疗传教士们时常建议他们转换环境,暂时离开福州享受海风和气候“温和”的地区带来的转变。可见,福州气候的健康性和致病性在怀理的医疗话语中反复出现,而“适应论”成了他调和两者的矛盾并解释气候与健康关系所依凭的理念^①。

无独有偶,这种称之为“适应论”的观点也体现在温敦的医学解释中。1856年7月,弼利民夫人因病新亡,而温敦也因健康恶化计划返回英国修养。他在即将离开福州前夕曾受弼利民委托开具一份医疗建议。其中他概述一位在“东方”生活的西方已婚女性应该具备的理想体格说:

我会说“强健的身体”、能够经受住身体的疲劳以及不易受焦虑和低落的情绪所影响的坚韧的精神……如果我要从外在身体条件挑选能够适应东方(国度)的气候……我会说身高应该在5英尺6至8英寸左右成比例的强壮——稍宽的背部、胸部和臀部,有着强健的四肢和肌肉会更好^[41](P4-5)。

这份医疗建议关于女性在体格方面的苛求看似荒诞。但就温敦看来,西方女性需要拥有足够强健的体格来适应“东方”世界的气候与环境,并减少遗传疾病可能的诱发。同时,神经生理学的理念要求她们必须有着更加坚强的身体与心智应付家务劳动以及与“东方”事务打交道的疲累。

温敦并没有提及合格的西方男性的体格标准,但他从体液学说的角度对在榕西人的饮食习惯给出了针对性的意见。他坚持认为规律饮食对维持健康至关重要,在榕西人“每天需要定时温和地摄入两种肉类主食”。鉴于福州夏日的高温会令人食欲衰退进而导致人体功能的紊乱,他指出此时少量饮用麦芽酒和葡萄酒来“恢复食欲和精神”是调节身体的最好办法^[41](P5)。温敦给出的饮食建议并非罕见。在18-19世纪,西方殖民者普遍认为通过饮食调节来适应殖民地气候是有必要的。这种措施意在使身体体液达到平衡态从而维持身体健康。因此,诸如摄入肉类、适度饮(酒)水和摄入刺激物是常见的医疗建议^[42](P131-160)^[43](P28-29)。与怀理的观点相仿,温敦承认季节变换的确影响人体的功能运作,但他依然宣称:“关于福州府的气候,我认为总体上它在中国(口岸)是最健康的……我对这一说法很有自信。”^[41](P6)

在两人的医学话语中,气候先是被个体化为对体质要求的标准。随后气候被人格化为人的精神状态,冬春季恢复人的精力,而夏秋季使人倦怠。之后气候再被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准则,遵守这样的规律可使在榕西人长期维持身体健康。这种医学化的表述,不仅使福州气候不再是难以预料的地理要素,而且超越了此前在榕西人特别是传教士仅将气候作为认知对象的书写。来自西方医学的阐释通过身体化和日常化的视角将地方气候转化为一位可被“目视”和管控的“症状”^[44](P98-99),并以近乎解剖手术式的方式将它以体格、人格、饮食等条目一一拆分。于是,“东方”气候被剥离出地方自然与文化的语境中,转而重新为医学话语与西方人的身体、知识框架所诠释。它所提出的身体管理和生活规律进而为在

① 水土适应是近代西方有关热带气候与健康的核心议题。本文以“适应论”表示在榕西人对气候与健康的特殊书写。

榕西人适应地方气候提供有力的支撑。由此,来自近代医学的解释将陌生的福州气候纳入进西方熟悉的话语体系中,从而实现“东方”事象的消解与殖民建构。在这样的医学解释下,福州的气候绝非令疾病在榕西人群体蔓延的元凶。体格孱弱、缺乏养护与食欲不振导致的身体机能衰退才是疾病侵扰的直接原因。将病症归咎于这些可控因素,这意味着中国的南方口岸适宜西方人进驻,由此进一步巩固西方势力在华扩张的合理性。

来自外界对福州气候健康性的质疑一直延续至19世纪60年代。在再一次面对总会关于福州气候和适宜性的质询时,在榕的传教士们试图援引爱尔兰医师巴内特的观点来强化他们建构的福州形象。巴内特对福州气候的看法和给予的饮食调节建议几乎是温敦的翻版。有所不同的是,他一方面通过所掌握的气象记录来支持“福州是中国通商口岸中最适宜外国人居住的地点”;另一方面将福州传教士较高的患病率归结于住宅的不适宜^[45](P1-2)。住居问题本是在榕西人面临的棘手困境,却与医学解释一道成为捍卫福州健康形象的重要支撑。因此,在榕西人的地方实践和西方医学知识是他们对气候与健康书写的关键。在怀理的认知中,两者的联结在于如何使西人更好地适应地方气候与环境。而巴内特的观点正是对既往提出的“气候适应论”的回响。

无论是医疗传教士还是职业医师,都将疾病在福州频发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人的体格和生活环境而非气候。综合体液学说、神经生理学等西方医学传统和近代医学观念,他们基于福州气候、环境与具体病症提出的转换口岸、调整饮食等细致入微的医疗建议,既寓意着在榕西人能够克服疾病以适应该地的环境,又折射出有关气候的殖民话语。不难发现,从杨顺的气候认知到巴内特的医学解释,“适应”是其中一以贯之的主题。这种“适应论”不是一种全新的医学观念,而是西方医学为解释广阔的殖民地中遭遇的“千变万化”的疾病与环境,服务于帝国殖民扩张而做出的适应性改变^[39](P287)^[46]。从气候的“适应论”出发,在榕西人的气候书写、地方实践与西方帝国的殖民事业紧密相连。

四、“气候适应论”与福州口岸“气候书写”的多维因素

帝国殖民主义试图区分文明与人种优劣的内生需求,使得气候、健康、种族等因素逐渐成为西人认知与划分不同地域的标准^[47](P144)。总体上看,热带低纬度地区的气候往往被视为是有害的,易使生活其中的人群变得慵懒。而欧洲文明所在的中高纬地区则是有益健康的,这一气候区里的人民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在此种世界认知中,欧洲人在热带殖民地的生活需要警惕“劣种”文明对其的同化以及人种与道德衰退的风险。这种认知混合着对“东方”的地理想象,反复出现在殖民地文本、旅行及各类帝国叙事中^[48](P151-163)。

在18-19世纪初,受启蒙运动思潮的影响,殖民者普遍认为欧洲人能够克服热带气候的危险进而实现对热带环境的“适应”^[47](P145)^[49]。但在19世纪中叶,殖民模式从拓殖向管理的转型引起了西方世界观念的变化。尽管新兴的细菌学说为“适应”提供了支撑,可更多人对欧洲人能够适应热带气候的观念持怀疑态度,认为人种与生活区域存在内在的绑定^[1](P93-96)。很明显,在榕西人深受有关气候适应探讨的影响,但他们的气候书写却与西方主流话语存在一定差异。

中国的通商口岸并不属于热带,可却在西方人的区域划分中时常与热带地区归为一类^[3](P82, 124)^[9](P76)。而西方的殖民话语也的确回响在气候与健康书写中。但如果说在榕西人对气候和健康的理解仅是对殖民事业的映射,那么难以解释的是他们的“气候适应论”与西方关于适应热带的讨论存在的明显不同——福州的气候是健康的,而热带的气候是有害的。而且,在西方世界对气候适应的认知正在转向之时,在榕西人仍然坚持“适应”的可行性。这种差异表明在榕西人关于地方气候的论断绝非仅是帝国事业的拥簇。有别于围绕“适应热带”产生的医学与生物学争论,他们基于医学、生活实践与空间感知而衍生的“气候适应论”不仅体现出气候认知与历史书写的“在地性”,还进一步将气候的分类体系引入进热带与“东方”的亚热带之间。这实质上细化了热带与非热带的殖民二元对立。通过将疾病归咎于

可以得到改善的住房和生活方式，“气候适应论”为帝国与殖民事业在中国通商口岸的扩张提供了话语支点。

在19世纪50年代,相比于其他通商口岸,关于福州气候优越的论断并非空穴来风^[50](P149)。广州濒临热带、气候已属不适,地方绅民持续的敌意更令西人不喜。厦门虽然风景宜人,但恶劣的环境和西人持续的死亡使它仍未摆脱不利健康的恶名^[43](P41,44)。在纬度更高的口岸中,宁波的气候和环境已被部分西人视为有害健康^[51](P12)。在上海,气象数据同样被用来论证此地夏季的炎热、连绵的雨季和剧烈变化的温差对健康的不利影响^[52](P390-391)。虽然近代中国口岸城市的气候与环境关联的历史书写有政客、商人、医师和传教士等不同主体,从而使开埠早期的相关口岸的历史书写大多只是商业贸易报告等主流话语的附庸。但在福州,迟至1854年才开始兴盛的茶叶贸易和变动频繁的领事职员不仅令英美传教士成为在榕西人的主要群体,而且使他们的气候与健康的历史书写有别于其他口岸。

为评估口岸条件并推动传教实践,他们运用西方科学知识来测量、评判福州气候,并依赖医学的指导以更好地适应本地的水土环境。当福州仍处于西方视野中的边缘地带时,他们又在这“东方”气候和环境 下坚持宣称着西方势力的在场。事实上,福州传教士一度作为推动西方势力在福州扩张的主导力量,他们的活动源源不断地为外界提供福州消息。在福州贸易将兴之际,福州美以美会的麦利和曾多次与英国驻华公使文翰会面,并致书文翰以传递福州贸易的最新消息^[53](P47-53)。他的情报切实弥补了西方对福州贸易情报的缺失,直接促成了福州外贸的兴起,成为气候书写、传教实践与殖民事业之间潜在关联的表现。

在科学术语的表述之外,个体经验、身体感知乃至文化理念则是在榕西人特别是传教士书写福州气候的重要维度。在经历曼谷“恶劣”的环境和与亲人的生离死别后,福州的气候对于杨顺与弼利民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种解脱。特别是冬春季凉爽的气温带来的舒适感,使他们即便在遥远的“东方”国度也有种身处故乡的感觉。对于柯林而言,福州气候的健康性与文化信念紧密相连。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坚信其身体能够适应本地环境并且逐渐康复,以此他能够证明外界对福州的错误认知^[54](P158)。可以说,柯林试图以“身体存在”强化有关地方气候和健康的叙事以对抗来自外界的异域想象。柯林曾于1850年从中洲岛迁往南台岛居住,岛上重新修筑的房屋与此前的住所相比有着不小的改善。良好的通风和贴切西方人的住所空间也支撑了他适应福州气候的信心^[54](P152)。在他的认知中,健康不仅与天气直接相关,地势、住址和住宅样式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至关重要。以一种空间的视角阐释环境、气候和健康的关系是柯林等福州传教士由住居和城市认知延伸出的独特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福州的微观地貌也为在榕西人适应气候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地理条件。自柯林之后,在榕西人相继迁离中洲岛,美部会传教士大部分迁往南台保福山,而美以美会传教士则在南台岛仓前山上营建住宅。相对拔高的地势以及翻修后的家宅强化了他们能够适应“东方”气候的信念。不仅如此,这些地势较高的山丘和岛屿覆盖着与城市景观截然不同的自然风光,逐渐成为在榕西人游憩、散步的生活空间。此外,福州东侧的鼓山还为他们逃避夏日的炎热提供了休憩场所^[12](P53-55)。自然景象既是本地气候的产物,也为在榕西人适应气候提供了身心转换的环境。因此,福州的微观地貌非常符合西方医学对健康地带的定义。在巴内特的医学解释中,福州触手可及的优美景色和较高的地势有助于西方人适应地方气候,这使它优于上海这座更偏北的口岸城市^[45](P2)。气候、健康与地理环境的紧密关联在西人的住居生活实践以及医学解释中得到进一步阐发并导向一种“气候适应论”,充分体现了在榕西人的气候书写中源自于地方生活的独特烙印。

在所有的因素中,居住问题则是在榕西人特别是传教士能否适应地方气候的关键。由于西人在福州租赁土地过程中常遭遇地方阻力^[55](P20-43),所以他们有时不得不多人共处一室或长期居住于失修的临时居所,疫病因而随之而来。美部会传教士夏查理就曾在他的个人信件里抱怨狭小的住宅严重损害了健康^[56](P2)。在榕西人不断将居住条件与生活方式推向健康问题的核心,这转而成为他们引入医

学话语以捍卫福州健康形象的重要依据。他们租赁土地的行为依赖本国势力的政治影响力,又为西方商人在福州定居和进行土地交易提供了便利^[55](P35)。可见,在榕西人的气候认知表面上有别于流行的热带地区不利健康的叙事,实质上仍将福州纳入由殖民逻辑与西方健康标准编织的气候话语。而“气候适应论”指导下的地方实践则支撑了帝国与殖民事业的在华扩张。于是,由医学观念延伸出的“气候适应论”将在榕西人的气候书写与地方实践同西方帝国的全球殖民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五、福州口岸“气候书写”的西方殖民话语之实质

当气象科学的发展逐渐将气候转化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时,在榕西人关于福州口岸之书写随之将气候纳入可以感知的领域,身体、住居和生活成为他们衡量气候的微观尺度。福州鲜明的季节变换和悬殊的温差直接作用于他们的体表感知和精神状态,风向、光照和降水则成为他们住居选址和营造的重要参考。健康与气候,总是与在榕西人日常生活相伴生。来自气象数据的证明虽未远离他们的气候书写,但亦未超出他们具身体验的范畴而完全成为区分气候的客观指标。

适应,是在榕西人与福州气候互动的基调。亚热带的气候、异域的生活模式要求西人特别是传教士通过改善环境、营建和修缮住宅等方式来适应在“东方”世界的生活。然而,来自疫病和死亡的侵袭使得西方人的体质能否适应福州的气候和环境成为疑问。面对现实挑战,近代西方医学引导在榕西人以管控身体和调节习性的方式来适应福州气候。这种“气候适应论”,既融合了在榕西人试图认识地方气候与环境的意向,又反映了客观气候在日常生活中的具象。在相关历史书写中福州的城市空间和地貌往往与人的生活 and 气候存在某种联系,它们的存在与“气候适应论”关联成为在榕西人理解气候与健康关联的支点。而这又总是与帝国事业与殖民活动相交缠。

在19世纪中期的西方全球殖民体系中,在榕西人关于福州健康形象的塑造是西方殖民话语在东方晚清帝国的回响。他们驻扎在这块东方与西方的“接触地带”,为西方世界理解东方城市提供必要的信息。他们的“在场”为西方资本和政治势力渗入福州提供了窗口。但帝国殖民话语的宏大叙事并不能取代在榕西人与地方相遇的微观意义,文化理念、群体经验和福州的地理特性使得在榕西人对福州气候的历史书写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这种地方叙事与18世纪以来西方帝国殖民话语中西方世界以外的热带或低纬度地区气候环境不健康的历史叙事并不一致。

然而,掌握着西方医学知识的在榕西人特别是医疗传教士对福州气候与环境作出的医学解释,既调和了地方实践的异质性对全球殖民话语与帝国想象的冲突,又导向了基于生活实践与空间感知的“气候适应论”——一种新的历史叙事。一方面他们的医疗建议将福州气候解释为西人身体的延展,通过对身体的管理,西方殖民话语实现了对福州气候的“肢解”。另一方面,基于对气象与疾病“科学”观测的医学解释又支撑了他们“适应”地方气候和环境以达到特定群体从事文化殖民活动的可能,进而将福州纳入业已生成的气候分类体系中。气候健康的客观标准与主观感知混淆从而含混不清。这使得西式的生活方式和场所空间反而成为在榕西人对“气候适应论”的具体诠释。由此可见,19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榕西人对福州“最健康的口岸”之形象建构,实际上涵融了西人特定群体的医学知识、文化理念、群体经验、具身感知、区域环境地理等多种因素。看似不同于近代西方世界对全球南方低纬度地区气候与环境“不健康”的固有认知,“气候适应论”却在以西方观念建构气候健康的同时,细化了殖民话语下的气候分类体系,从而难以遮掩西人基于其文化殖民之需而建构一种新殖民话语的实质。

参考文献

- [1] D. N. Livingstone. Tropical Climate and Moral Hygiene: The Anatomy of a Victorian Debate.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1993, 32(1).
- [2] M. Mahony, G. Endfield. Climate and Colonialism. *WIREs Climate Change*, 2018, 9(2).
- [3] D. N. Livingstone. *The Climate of Empire: A History of an Ide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4.

- [4] 麦克·休姆. 风侵雨蚀:气候的文化意蕴. 孙民乐译. 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21.
- [5] H. R. Woolock. "Our Salubrious Climate": Attitudes to Health in Colonial Queensland//R. Macleod, Milton Lewis. *Disease, Medicine, and Empire: Perspectives on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Experience of European Expansion*. London: Routledge, 1988.
- [6]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考古学报, 1972, (1).
- [7] 满志敏.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9.
- [8] 韩宾伟. “天祸晋邦”:气候、灾害与永嘉丧乱.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5, (4).
- [9] 李尚仁. 十九世纪中国通商港埠的卫生状况:海关医官的观点//祝平一. 健康与社会:华人卫生新史.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 [10] 刘士永, 刘豪. 近代上海医官对霍乱致病论的认知与分流——以江海关和工部局为中心(1869-1896).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4).
- [11] D. N. Livingstone. Scientific Inquiry an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R. Finnegan. *Participating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 Researchers Beyond the Universit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12] 吴巍巍. 真实与扭曲——西方传教士视野中的晚清福建社会之研究.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 2006.
- [13] The National Archives, London(hereafter TNA). Foreign Office(hereafter FO) 17/89: Davis to Earl of Aberdeen, October 15, 1845.
- [14] Anonymous. Letter from Mr. Doty. *Missionary Herald*, 1846, 9(5).
- [15] S. Lane-Poole.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Volume I*.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94.
- [16] A. Hillier. *The Alcock Album: Scenes of China Consular Life*.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24.
- [17] 施美夫. 五口通商城市游记. 温时幸译.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 [18] G. Smith. Notice of Fuhchau fü. *Chinese Repository*, 1846, 15(4).
- [19] 姜修宪. 环境·制度·政府——晚清福州开埠与闽江流域经济变迁. 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 [20] 姚贤镐.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 [21]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Twenty-Eigh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New York: The Conference Office, 1847.
- [22]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hereafter NLC). 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hereafter PABCFM). PABCFM. REEL 232/290: Johnson to Anderson, January 9, 1847.
- [23] NLC. PABCFM. REEL 232/292: Johnson to Anderson, April 10, 1847.
- [24] S. Johnson. Notice of Fuhchau fü. *Chinese Repository*, 1847, 16(11).
- [25] NLC. PABCFM. REEL 232/294: Johnson to Anderson, Notices of Fuh-chow-foo(no date).
- [26] 安宁, 朱竝. 他者, 权力与地方建构:想象地理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人文地理, 2013, (1).
- [27] NLC. PABCFM. REEL 232/326: Peet to Anderson, April 17, 1847.
- [28] United Methodist Church(hereafter UMC). Collins, J. D., 1847-1848: Collins to Pitman, September 15, 1847.
- [29] NLC. PABCFM. REEL 232/328: Peet to Anderson, October 4, 1847.
- [30] UMC. White, Moses Clark, Foochow 1845-1849: White to Pitman, September 30, 1847.
- [31] S. Johnson. Notice of Fuhchau fü. *Chinese Repository*, 1847, 16(10).
- [32] NLC. PABCFM. REEL 232/331: Peet to Anderson, May 25, 1848.
- [33] NLC. PABCFM. REEL 232/299: Johnson to Anderson, June 29, 1848.
- [34] NLC. PABCFM. REEL 232/172: Baldwin to Anderson, July 1, 1848.
- [35]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Thirty-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New York: The Conference Office, 1850.
- [36] NLC. PABCFM. REEL 232/302: Johnson to Anderson, January 10, 1849.
- [37] 爱德华·萨义德. 东方学. 王宇根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 [38]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Thirty-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New York: The Conference Office, 1854.
- [39] M. Harrison. *Medicine in an Age of Commerce and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40] I. W. Wiley. Introductory Notice of Fuh Chau//I. W. Wiley. *The Mission Cemetery and the Fallen Missionaries of Fuh Chau, China*. Boston: Phillips, Sampson and Co., 1858.
- [41] NLC. PABCFM. 232/362: Welton to Peet, August 4, 1856.
- [42] A. Bewell. *Romanticism and Colonial Disea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 [43] 吴芳思. 口岸往事: 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 柯直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
- [44] 米歇尔·福柯. 临床医学的诞生. 刘北成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45] NLC. PABCFM. REEL 232/160: Barnett to Doolittle, December 8, 1857.
- [46] 杨祥银. 殖民医学史: 术语内涵、核心争论与多元视角. 学术研究, 2022, (8).
- [47] G. C.D. Adamson. "The Languor of the Hot Weather": Everyday Perspectives on Weather and Climate in Colonial Bombay.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12, 38(2).
- [48] J. Duncan. Dis-Orientation: On the Shock of the Familiar in a Far-away Place//J. Duncan, D. Gregory. *Writes of Passage: Reading Travel Writing*. London: Routledge, 2002.
- [49] M. A. Osborn. Acclimatizing the World: A History of the Paradigmatic Colonial Science. *Osiris*, 2000, 15(1).
- [50]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New York: Carlton and Porter, 1861.
- [51] A. E. Moule. *The Story of the Cheh-kiang Mission*. London: Seeley, Jackson, & Halliday, 1878.
- [52] W. C. Milne. *Life in China*. London: G. Routledge, 1857.
- [53] TNA. FO 17/212: Maclay to Bonham, December 6, 1853.
- [54] W. H. Collins. Rev. Judson Dwight Collins//I. W. Wiley. *The Mission Cemetery and the Fallen Missionaries of Fuh Chau, China*. Boston: Phillips, Sampson and Co., 1858.
- [55] E.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56] NLC. PABCFM. 232/282: Hartwell to Anderson, January 7, 1858.

The Special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Climate" and "Health" In Modern Southern Treaty Ports

A Case Study of Fuzhou as "the Healthiest Port" in the 1840s and 1850s

Meng Aiyun, Liu Xinyu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ole of colonial climate discourse in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 undertakings has long occupied scholarly attention. High mortality rates among modern Western colonizers across the tropical regions of the Global South aroused anxiety about the link between southern climate and human health. In sharp contrast, Fuzhou, one of the five treaty ports, was regarded as a salubrious port city by Western visitor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port opening and even "the healthiest port city" according to som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climate narratives based on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s, personal perceptions,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and local practices.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Fuzhou's climate constituted a localized expression of global colonial climate discourse. By distinguishing the "healthy" non-tropical environment of Fuzhou from the "deadly" tropical regions, they consolidated the global climatic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Western imperialism. The spread of epidemics among the Western community in Fuzhou during the 1850s temporarily challenged such established narrative. Faced with growing doubts over regional climatic conditions, Westerners defended their discourse on Fuzhou's salubrity by resorting to the medical theory of climatic acclimatization. This theory not only encapsulat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Western sojourners and Fuzhou's urban environment in the early treaty-port era, but also represented a unique historical colonial narrative forged by Westerners regarding modern Chinese treaty ports under global colonial discourse.

Key words treaty-port; climate; health; historical narrative; global colonial discourse

-
- 作者简介 孟爱云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吉林 长春 130024;
刘馨雨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桂 莉